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中国文学史

(5) 现代文学史

张光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從讀者者三四年其昆弟性
其余固知其或有成也前年
家時天寒大雪觀雪於池閣上
作竹樹時以凍不可去年春館
遂明以留齋舍凡閱兩寒暑而後
有未盡善也而坡陀之間林疎之
吾伯時用心而勞矣伯時心好畫
也之而不解至乙亥年四月廿日吳郡
題于吳氏舍館

太白文艺出
北京京联图

中心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中国文学史

(五)

现代文学史

张光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 / 廖群等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中... II. 廖... III. 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10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中国文学史 (1—5)

廖群 郑训佐 荆立民 孙之梅 张光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50.375 印张 117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80-191-X / I·110

定价: 75.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绪 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路口蓦然回首 20 世纪初那一场将文学真正推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文学革命,我们不禁会感到在时间上它虽颇为遥远,但它的声音、气息又是那么切近,那么清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仍在五四文学革命所开拓的文学道路上探索前进,因之,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段历史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开端,它经历了从封闭的古典文学到与世界文学融汇的现代化的艰难转变,完成了从士大夫的庙堂吟诵到社会广泛传播的大众化的巨大历史变革。描述它,总结它,反思它,已成为一个永远新颖而必需的时代课题。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现代特质自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与西方文学近现代数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它似乎已是姗姗来迟,但它又确实是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质的飞跃。究其根源,既有着时代的催生,也含有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既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强大的外力作用,又得力于对传统文学内在先进质素的扬弃。它不是在民族文学母体的内部自然而然地生发变异而诞生的,而是在中外古今文化大碰撞的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这其中必然蕴含着许多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是与民族意识的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文化先驱陈独秀曾把近代中国的意识觉醒过程概括为三个逻辑阶段,即科技意识的觉醒,政治意识的觉醒和伦理意识的觉醒,这一过程又是在外敌入侵、内外交困的近代社会变动中产生的。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封建王国

暴露出了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致命弱点。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被镇压，近代中国愈发落在世界后面，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开明之士从现实的教训中认识到西方的强盛在于其“战舰之精”、“机器之利”，只有积极从外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于是国内展开了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运动中，一方面知识分子以科学启蒙为己任，积极介绍、宣传西方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为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大大提高了国内的科技水平，在客观上也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然而，科技意识的觉醒并未在根本上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新的民族危机状态下，有识之士进一步意识到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于是变法维新运动成为新的救国方案，此所谓政治意识的觉醒。继戊戌变法失败之后，1911年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使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有觉悟的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启蒙者的身份大力宣传爱国、救国、政治革命的思想道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著作都洋溢着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他们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民主意识。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把他们的革命理想、政治使命意识，通过种种舆论武器进行明确表述，而且直接投身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总之，以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意识的日益觉醒既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作了大量的开启“民智”、传播西方现代思想的必要工作，为全民族进一步的意识觉醒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使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反思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屡屡失败的基本根源。陈独秀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界虽然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面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陈独秀精警地指出，国家富强之道不在于“贤人政治”、“立宪政治”之类，最重要的乃在启发“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提出了使国民真正走向“觉悟”的唯一出路：“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②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化的文化体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身依附关系，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正是它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超稳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文化先驱者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的觉醒，就没有民族的觉醒，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只有把“人”从传统禁锢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实现古老文明的新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于是，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正是在这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五四一代“人之子醒了”，而且发出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这里出发，才产生了“人的文学”、“平民的人学”、“人道主义的文学”，才产生了鲁迅的《狂人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

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随着文化中心的转换，文学走在了现代化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次，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声，晚清文学改良为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得以突破的内在历史根据。十九世纪末，随着政治意识的觉醒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的勃兴，晚清文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适应“维新”和造就一代“新民”的需要，发动了“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改良运动中，他们初步意识到传统文学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的活力，已经不能担负起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社会职能，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体系，借鉴西方文学的新思维、新方法，创造“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新意境”。在创作上，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政治小说，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为代表的谴责小说等在叙述视角、结构方法、表现体式和描写手法方面都作了多种有意义的探索。南社诗人等的“新体诗”在内容上注进了近代新思潮，在形式上也部分地突破了旧体诗的限制，语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迥异于“同光体”的新特色。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在形式、风格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束缚，在一些理论观念上也常常表现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不旧不新，亦旧亦新的过渡时期的烙印。尤其在总体思想意识上重政治革命而忽视文化启蒙，缺乏个性鲜明的现代特质。但它毕竟顺应了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潮流，终于把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学正统观念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断裂的开始。

第三，中国新文学是在先驱者主体中介的能动作用下，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文学思潮与艺术手法的基础上诞生的。鲁迅甚至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

说》小引》)十五世纪以后,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先导,西方各民族陆续经历了各自的文学革新运动,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潮风靡欧洲文坛。时隔几个世纪,当中国文学从“非人”的封建传统中苏醒过来之时,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体系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思想意识的先天缺乏,要摧毁传统文学,就必须“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以“煮自己的肉”,(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必须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大胆无畏地吸收先进文化文学营养,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固有劣根性来一次“根本扫荡”(李大钊语)。早在清末文学改良运动中,梁启超、林纾等人就极为注意对西方及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介绍。尤其是林译作品数量众多,包括各种式样、各个国家的作品。其中有莎士比亚的剧本,狄更斯的小说,大仲马、小仲马、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杰作。而且他还在译本的序言中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方法。当时的中国青年,包括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鲁迅、郭沫若等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五四文学革命展开之后,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学习更是一种普遍的时尚。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被一一引进,直接推动了五四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新青年》在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之前就发表了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论》,向国内介绍欧洲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与几种“主义”,并提出中国文学应该“趋向写实主义”。在1918年的“易卜生专号”中,《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又首先介绍和分析了易卜生文学作品中的“写实主义”,国内读书界“易卜生热”、“娜拉热”风靡一时。易卜生的“写实主义”还直接影响了五四“问题小说”、“问题剧”的创作热潮。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王统照的《俄罗斯文学的片断》,郑振铎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等论文倾注于俄国文学的真实性、平民化,以期从中汲取创造中国新文学所必需的营养。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宣布“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小说月报》有计划地“译述西洋名家小说”，“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改进之方法”，先后出版了俄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专号、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泰戈尔研究专号等，切实而又广泛地介绍研究了世界进步文学。除此之外，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等也都致力于世界文学的介绍与翻译。

五四时期，这场学习、引进外国文学的热潮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吸收面极为广泛。从创作方法、审美格调到具体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从近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从小说格局、诗歌形式、话剧艺术到人物塑造的具体手法（包括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等）……这些都在五四文学创作中被广泛地尝试着、运用着。二是吸收层次的混杂与多向。五四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与外国文学的联系是单一的，而是常常以某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为主，同时又汲取了更多、更广的外国文学营养，表现出接受层次的极度复杂性。例如郁达夫在开始写作之前就阅读了俄、英、法、德、日小说“一千部内外”，而其中许多艺术特点都在他小说中有所体现。郭沫若的《女神》则受到泰戈尔、惠特曼和歌德等多位文学大师的影响。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固然说明五四文学在短短几年间走过了西方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不免显得匆忙驳杂，甚至有食而不化的欧化倾向，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敢于吐故纳新的宏阔眼光、历史主动性与自觉意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现代文学的新生。郁达夫在谈到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意义的时候，言其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郁达夫文集》第6卷）确为中的之论。

第四，由于强大的外力作用掩盖了传统文学内在的某些素质的发展惯性，五四作家表现出了有意反传统与无意承传统的内在矛盾。鲁迅曾经说过：“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

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① 这里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批判旧文学中发生发展而同时对于旧文学又有所继承、有所择取的经验总结。但五四时期对传统的继承主要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在中国第一批新文学家，凡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者，无一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就鲁迅来说，他的小说创作的丰富多彩的表现方法，时常可见到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继承，至于他的文学语言和文体风格更是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赠鲁迅，郭沫若曾专门分析了《庄子》一书对鲁迅语言风格的深刻影响，许寿裳则在《屈原与鲁迅》中就鲁迅作品中有许多来源于《离骚》的词语证明他“熟于屈子”，这些都是颇有道理的。五四时代的作家为了实现文学现代化的质的飞跃，针锋相对地驳斥“国粹派”的保守言论，必须采取“重估一切价值”，彻底反叛传统的决绝姿态，他们明确意识到，对强大的传统文学及其保守者稍有迁就就无法完成文学革命的目标，因此在主观感情和自觉追求上他们竭力回避继承优秀遗产的问题，这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必需的策略。正因如此，当现代文学完成五四文学革命，走上深入发展的轨道以后，对旧形式的采用也就不再意味着保守的问题，尤其在四十年代，大众化、民族化不仅是文学界探讨的主要艺术课题之一，而且成为许多作家主动、自觉的追求。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辉煌开端 (1917——1926)	(1)
第一章 五四文学观念:在决绝中获得新生	(1)
一、“弃鬼话而取人话”——中国文学领域的 “哥白尼革命”	(1)
二、从“活的文学”观到“人的文学”观 ——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7)
三、“人的文学”观深入发展的不同审美趋向	(11)
四、五四文艺思潮的复合形态	(18)
第二章 五四文学主体:巨人的时代与时代的巨人	(24)
一、应历史呼唤而出的第一代“现代人”	(25)
二、一代“超人”式的思想行为模式	(27)
三、现代的“孤独者”与自觉的内省意识	(33)
第三章 五四文学创作:在“人”的旗帜下	(40)
一、启蒙浪潮:不倒的人道主义大旗	(42)
(一)觉醒者俯视下的“人”	(42)
(二)觉醒者平视中的“人”	(49)
二、自我表现:挖掘不尽的“内心郁积”	(53)
(一)高唱“新我”的诞生	(54)

(二)“生的苦闷,性的苦闷”	(56)
(三)“为爱情而歌咏爱情”	(58)
第四章 中国文学结构范式的瓦解与重建	(61)
一、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61)
二、五四文本体系的建构过程	(69)
三、五四文本结构的现代新特质	(78)
第五章 一代文体家的诞生	(91)
一、现代小说之父	(91)
二、五四诗坛的一颗巨星	(99)
三、一代美文大家	(103)
第二编 现代文学多元探索的新格局 (1927—1936)	(115)
第六章 作家群落的集中与分化	(115)
一、文化观念的“大转变时期”	(115)
二、后期创造社的转向	(117)
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及论争	(118)
四、“左联”的成立及左翼文艺运动	(122)
五、作家群体的分流	(126)
第七章 社会文学走向成熟	(130)
一、普罗文学创作	(130)
二、社会分析文学的创作高潮	(133)
三、战斗的“投枪”与“匕首”	(135)
第八章 启蒙文学创作新潮流	(139)
一、反封建主题的延续与发展	(139)
二、国民性的新探讨	(145)
三、文化启蒙的转向	(155)
第九章 自我表现别一途:从“人的文学” 到“个人的文学”	(166)

一、现代情感的低吟浅唱	(166)
二、现代人的“新感觉”	(174)
三、“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179)
第十章 现代文学的艺术黄金期	(183)
一、总论	(183)
二、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191)
三、新诗艺术的高度成熟	(206)
四、中国现代话剧的艺术高峰	(214)
第三编 战争文学的主旋律与新的分化发展 (1937——1949)	(222)
第十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文艺运动与作家的共同选择	(222)
一、战争文化心态与作家群体的殊途同归	(222)
二、“文协”的成立与文艺救亡活动	(225)
三、国统区文艺论争及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	(230)
四、工农兵文学观的形成	(235)
第十二章 战争文学:救亡的呐喊与歌颂的主潮(上) ——国统区创作:向生活深层掘进	(241)
一、讽刺文学与“影射文学”	(242)
二、战争风云与时代悲剧	(247)
三、忧郁的“土地之爱”	(254)
第十三章 战争文学:救亡的呐喊与歌颂的主潮(下) ——解放区创作:歌颂的主旋律	(262)
一、“新的天地,新的人群”	(264)
二、记录农民翻身解放的革命史诗	(270)
三、劳动人民的翻身歌唱	(273)
第十四章 “人”的主题:已不仅仅是反封建	(276)
一、启蒙文学创作的再发展	(279)
二、描绘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	(287)

三、刻画“普遍的永恒的人性”	(294)
第十五章 艺术形式的新变与发展	(305)
一、总论	(305)
二、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成就	(312)
三、自由体诗的新高峰	(318)

第一编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辉煌开端 (1917—1926)

第一章 五四文学观念：在决绝中获得新生

一、“弃鬼话而取人话” ——中国文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

历史的发展常常表现为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碰撞所引发的突变。在我们今天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确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别无选择的突破口。如果没有那样一场运动，没有陈独秀等人坚守白话对文学的替代“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决绝姿态，五四文学革命能否取得那样大的成绩是很难逆料的。但从历史实际来看，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肇始确含有偶然性的因素。胡适在美留学时，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监督处有一名书记员，极力主张“废除汉字，取用字母”，认为要普及教育非用字母不可。对此主张，胡适大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不懂汉文的人，是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胡适《逼上梁山》）1915年夏，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在“研究部”的年会上，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认为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在文中，他仅仅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并没有意识到非用

白话代替文言不可。而且此时的胡适更为重视各种“新潮”的输入。1915年9月17日,胡适曾为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赠诗一首,其中有云“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①这些都是互相勉励从事文学革命报效祖国的话,不料竟引起了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亦作一首打油诗,题名《送胡生往哥伦比亚》,戏耍胡适。本来是严肃作诗,却遭好友奚落,尤其是对“文学革命”一句的挖苦,更令胡适气愤不过。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比较模糊的,不知从何处入手,此时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想法。在回敬任鸿隽的诗中,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②第一次提出作诗要如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此后,胡适又与几位朋友不断争论,在笔战中思想渐趋成熟,并于1916年春形成这样的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多“文学革命”,自《诗经》以降,中国诗歌的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胡适《逼上梁山》)经过几次辩论,梅光迪被说服,表示赞成他的主张,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学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胡适《逼上梁山》)经过思考和试验,胡适于1916年8月将写作白话文的经验归纳成著名的“八事”,主张以白话文作诗、作文、作戏曲、作小说。

此时远在国内高举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大旗的陈独秀等人正苦于找不到文学革命的具体措施。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的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他的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

① 白吉庵《胡适传》,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白吉庵《胡适传》,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处，而编辑却附辞称赞其为“希世之言”。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独秀在回信中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楷模，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胡适来往书信选》）这说明陈独秀此时已感到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新文学革命运动，而文学革命虽有了写实主义的目标和主张，却“实无办法”，胡适的“八不主义”，可谓是“雪中送炭”！

从事实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的前后几年中，先驱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白话文革命的关键性作用的。他们关注的重心在于确立起新时代的文化思想。鲁迅对“任个人而排众数”思想的探讨，胡适对“新思潮”的呼唤，陈独秀将“伦理的觉悟”断言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些都将是视线集中在文学革命的精神层面，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即使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开始标志之一的文章——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是更多、更笼统地从思想内容层面提出“打倒××××”、“建设××××”。即使谈到语言问题，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如有人主张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有人认为应在文言基础上吸收新的语汇和概念，有人建议用白话交际、作文，而以文言写诗歌、美文等等。但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发表，立刻以其明确的革命目标乃至步骤，仿佛使人们茅塞顿开，将几乎所有先驱者们吸引过来，纷纷声援、支持，并进一步探讨白话文运动。

先驱者们最终意识到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的古文正制约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阻碍着中国国民对文化、科学的掌握，因而也阻碍着中国国民的现代化。问题摆在了面前：无论用什么“救国”、“救人”，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国民的“大多数”迅速掌握文化、科学。而且其时西方各国都已是“言文合一”，国民文化教育水